

## 談迄今發現最早的一件 商代玉「羽人」

彭適凡

在江西新淦商代大墓出土的百餘件玉器飾品中，有一件特別引人矚目的藝術絕品——側身羽人玉佩飾，當人們有機會觀賞它時，無不為其獨特的琢雕技藝而驚嘆！以往，曾有專文作過簡單介紹，並確切地稱「是迄今發現最早的商代羽人」<sup>①</sup>。這裡，筆者擬再就其造型特徵、名稱、功能及相關問題，談一些初步意見，供大家研究參考。

側身羽人佩飾(標本628)，呈色為柔和的棕紅色。摩氏硬度2度以下。有滑感，質滋潤，蠟狀光澤。瑛料純真無瑕，色澤均勻。屬葉蠟石類，大致與浙江青田石中「紫檀凍」相當。該佩飾作側身蹲坐狀，兩側面對稱；「臣」字目，粗眉，大耳，鳥式鉤喙<sup>②</sup>；頭頂部著冠，冠亦作鳥形，鳥為尖喙突胸，作匍伏狀，尾斂並後捲成一圓角方孔，再以掏雕技法琢出三個相套的活鍊，每個鍊環呈圓角長方形，中間一個較長；雙臂拳屈於胸前，膝彎曲上聳，腳板底與臀部平齊，其上有方形短樺，樺部有一橫凹槽，併攏的小腿下部有一斜穿孔。腰背至臀部陰刻出鱗片紋，兩側則各雕出羽翼，腿部也琢出羽毛。此玉羽人出土於棺中死者頭部，具體在項鍊的頂端右側。從腳底板有方形短樺及小腿下部有斜穿孔看，當有可能作鑲嵌或佩繫之用。出土時，羽人之「臣」字目中尚留有紅硃痕。羽人與三套環係用一整塊瑛料圓雕琢成，是此批玉器中費工最多、技藝最高的玉製品。通高11.5、身高8.7、背脊厚1.4、前胸厚0.8厘米(圖一)。

這件側身羽人玉佩飾，和以往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一種羽人(圖二)，有某種相近的因素<sup>③</sup>，諸如側身、「臣」字目、大耳、雙臂拳屈於胸前、足底有短樺等等，但若細加對比，也不難發現它們之間的明顯差別：總的體態，

後者為側身蹲踞式，前者為側身蹲座狀；後者有冠或高冠，前者有冠且琢成一鳥形；後者為高鼻或翹鼻，前者的鼻不很顯明；後者為張嘴，前者為尖喙並帶鉤狀；後者為浮雕，用雙線雕技法，雕出隨造型變化而變化的線紋，前者則為圓雕，雖也用雙線雕技法，但線紋少見，而且琢出殷墟玉器不見的羽翼和羽毛。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有一件側身玉人<sup>④</sup>，高10.2厘米(圖三)，基本形體與婦好墓出土的相同，惟高冠略異。美國布法羅科學博物館(Buffalo Museum of Science)也珍藏一件<sup>⑤</sup>，高8.7厘米(圖四)，形體與上述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的基本一致，以至連大腿上琢飾的「卍」圖案都完全相同，稍不同的是，美國布法羅科學博物館的一件，頭冠為一尾上翹捲的獸類動物。商殷時期的這種側身玉人在海外其它各地還有一些收藏，此不一一例舉。它們都和婦好墓出土的玉人相同，一個共同點就是沒琢出羽翼和羽毛，而這也正是中原側身和新淦側身玉羽人的最主要、最本質區別。

有必要特別指出的是，新淦的側身玉羽人，不僅腰背兩側琢出羽翼，猶如兩翅，腿部垂羽毛，而且嘴呈鉤喙，頭頂上還有一伏鳥作冠，可謂從頭至腳都充分地表現出「鳥」的特徵，但又有機地把人和鳥集於一身，雕琢成一個賦有濃厚怪誕色彩的「羽人」或稱「羽神人」的形象。

人們要問，新淦側身玉羽人為什麼和中原殷商玉人有這明顯差異？這決不能看成是玉工們隨意的一時之作，而應是鄱陽湖贛江流域古代先民固有的傳統精神風尚的反映，是該地區遠古土著先越民族鳥圖騰和鳥崇拜的一種遺俗和變異。

Peng Shifan : Director, Jiangxi Provincial Museum, China  
Director, Jiangxi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China  
彭適凡：江西省博物館館長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

誠然，殷商先祖係東夷人，也曾以鳥為圖騰。《詩·商頌·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在甲骨文中也有不少遺跡<sup>96</sup>，但是，據現有考古資料全面分析，中原華夏民族最盛行的是龍的崇拜，出現的歷史也最早。以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器物為例，玉龍的形象較多，玉鳳(玄鳥)祇有一件，在銅器上，也出現較多的龍紋，而鳳紋極罕見，「從這些現象看，殷人不但珍視鳳，而且相當喜好龍。」<sup>97</sup>目前我國發現的華夏第一龍也推河南濮陽西水坡M45大墓發現的那條蚌塑龍<sup>98</sup>，距今已六千餘年。此後隨著歷史的演進，以華夏族為中心的民族日趨融合，龍鳳相配，龍鳳結合，最後它融合於龍文化之中，但這並不能否定古代的「南鳳北龍」<sup>99</sup>的客觀歷史事實。

新淦出土的側身玉羽人所反映出的鳥圖騰和崇拜的遺俗，在新淦商代大墓出土的其它遺物上也有不少子遺，諸如在兩件扁壺足銅鼎(標本26、27)的立耳上，各伏有一鳥(圖五)；雙尾虎(標本28)的背上有一立鳥(圖六)，鏄的舞部兩端各伏一鳥，借一鳥殘(圖七)；一件直內戈(標本118)內部，兩面均鑄陰刻的雙人首紋，除鼻外，四官皆備，頭上兩側各插二根分別外捲的羽翎(圖八)；在一件與側身玉羽人同樣引人矚目的「神人獸面形玉飾」，有著高聳、左右卷角的羽冠，羽冠由豎刻十一組作放射狀的羽翎組成，整個玉飾的正面浮雕圖案應為一個戴著卷角高羽冠的神人獸面形象<sup>100</sup>，和「羽人」、「羽神人」有著共通的文化因子。

不僅如此，在與新淦大墓同一時代、同一青銅文化系統的樟樹吳城遺址中<sup>101</sup>也出土有鳥圖騰遺俗的文物，諸如在一件釉陶紡輪(吳城75T21(4)：151)的正面左上角，刻劃有一鳥首圖案，也係尖嘴、凸目；採集到的二件陶研磨棒，棒頂塑成鳥頭，兩側各戳印一團點紋示眼睛，其中一件的額面正中戳印一團點紋；在吳城附近之三橋橫塘曾出土大、小銅鼎各一件，其大者豎耳上臥虎，小者豎耳上立鳥<sup>102</sup>；更有意義的是吳城遺址出土一件商代中期的青銅器蓋，蓋中央的捉手，為一凸目、尖喙(稍殘)、豎頸的鳳鳥，蓋沿一周為雲雷紋，蓋面為兩組展體式獸面紋，由多條卷雲並刀紋組成，乍

看，器蓋猶如一隻展翅匍伏的鳳鳥，構思巧妙，造型生動，堪稱南方青銅鑄品中的絕作(圖九)。此外，在九江縣神墩<sup>103</sup>、德安縣石灰山<sup>104</sup>等處古文化遺址中，也曾發現有鳥形或飾鳥形圖案的陶製品，尤以鳥狀陶把手為多。



圖一 側身羽人玉佩飾  
Jade pendent in shape of a "feathery man"



圖二 殷墟婦好墓出土玉人(標本518)  
Jade figure in the Fuhao tomb



圖三 玉人 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  
Jade figure in the museum collection in  
China



圖四 玉人 美國布法羅科學博物館收藏  
Jade figure in the museum collection in USA



圖五 立鳥扁足銅鬲(標本27)  
Bronze tripod with bird design



圖六 立鳥雙尾虎(標本28)  
Bronze sculpture of a bird standing on tiger's back



圖七 鈔(標本68)  
Bronze *bo*, musical instrument



圖八 雙人首紋直內銅戈(標本118)  
Bronze ge-halberd with human head design



圖九 鳳鳥青銅器蓋(樟樹吳城商代遺址出土)  
Bronze cover with bird design

發掘和研究古代器物上的有關古代圖騰崇拜的遺俗，對於深入探討和揭示古代文化的性質、面貌及恢復人類遠古時圖騰崇拜的歷史圖景，無疑都具有重要意義。

以鳥作圖騰和鳥崇拜，在我國淵源很早，雖然在新石器時代的諸如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岳石文化以及新樂文化和紅山文化中也都出土不少鳥形器或玉鳥，但特別盛行是在我國的東南和南方地區，也即歷史時期以後的百越分佈地區。在這一廣闊的地域內，遠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中<sup>[13]</sup>，就曾出土一批飾有鳥形圖案的文化物珍品，如雙鳥朝鳳的象牙雕刻，形如牙匕的鳥形牙雕，刻有兩組雙頭鳳紋的骨匕和木質蝶形器以及形如鳥首的器座、器組等。在馬家濱文化、崧澤文化和薛家崗文化<sup>[14]</sup>的諸遺址中，都出有鳥形壺等器物 and 圖案化的鳥紋。到新石器時代晚期，江南的鳥圖騰崇拜在良渚文化的玉器上更強烈地表現出來，如浙江餘杭縣的反山和崑山良渚文化遺址、墓葬中<sup>[15]</sup>出土了大量的玉琮、玉鉞、玉冠裝飾、玉三叉形器和玉牌飾等，在這些玉器上，有的琢有戴羽冠的神人像，有的刻出羽狀紋，有的還有鳥紋圖案。此外，在贛江流域的山背文化和樟樹築衛城、樊城堆以及新喻拾年山諸遺址中都出有「雞冠紐」形器蓋、鳥形把手和鸞形器等不同形式的鳥形遺跡。<sup>[16]</sup>在珠江三角洲地區也有鳥形圖案和鸞形器的發現。<sup>[17]</sup>總之，我國的東南和南方地區，從遙遠的古代起，這種鳥圖騰和鳥崇拜的表徵，可說比比皆是。而且從現有的考古資料看，還是這種崇拜的最早發達地區。儘管在這一大的區域內，遠古時代，各地有著各自不同的文化區系類型，但它們之間的文化紐帶極其緊密，實際上屬於一個大的文化共同體，「在歷史的長河裡，他們繁衍且分支出不同的氏族部落集團，但在根本性的文化因素方面還保留著內在聯繫。」<sup>[18]</sup>所以有著共同的圖騰信仰和崇拜物決非是偶然的。

進入歷史時期後，隨著崇拜對象的轉換，即從圖騰崇拜向祖先崇拜的逐漸轉化，但昔日的圖騰信仰和崇拜仍不時地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新淦側身玉羽人正是史前時代東南地區

這種鳥圖騰和崇拜在商周時期玉器上的一種遺俗和變異，它表現出一半是鳥另一半是人的怪異形象，即把所謂的「亦獸亦人」或「亦人亦獸」的一種「羽人」來作為自己民族的始祖或神人加以頂禮膜拜，這無疑是圖騰崇拜發展到盡期之後的產物，也是把現實生活中的人作為真正先祖來加以崇拜的開始。

正因為這件側身玉羽人是史前時代鳥圖騰和崇拜的一種遺俗，儘管時代相隔二、三千年，表現手法上也有所變異，但在具體表徵上，只要我們細加比較，仍不難發現它們之間內在的聯繫和變異的軌跡。

過去，我們曾撰文將新淦大墓出土的神人獸面形玉飾上的高冠與良渚玉器「神徽」頭上羽冠作比照，認為其表現手法及作風比較相似。<sup>[19]</sup>神人獸面形玉飾的羽冠係由豎刻十一組作放射狀的羽翎組成，恰好在崑山出土的一件良渚文化玉牌飾(M10:20)上正面的神人羽冠，也是由陰線刻出的十一組放射狀的羽狀紋組成<sup>[20]</sup>，不同的僅是前者為高羽冠，羽狀紋較長，後者為扁長方形羽冠，羽狀紋較短，但羽冠上羽狀紋的組合和數量的一致，決非是偶然的巧合，應該是有其內在的繼承和發展關係。側身玉羽人頭上之冠，非羽冠，而是直接雕琢成一鳥形冠，但無論是側身玉羽人的「鳥冠」抑或是神人獸面形玉飾上的「羽冠」，其隱義是共同的，都是遠古鳥圖騰和鳥崇拜的一種遺俗。此外，就羽狀紋而言，側身玉羽人腰背兩側及腿部所刻的羽狀紋，也與餘杭反山出土的冠狀飾(M16:4)上兩個人頭像上的羽狀紋相近，與瑤山出土的一件三叉形器(M7:26)上的側身人頭上的羽狀紋和中叉上的五組羽紋也很相仿。<sup>[21]</sup>應該說，商周時期在青銅器或玉器上流行的羽狀紋似都應淵源於良渚玉器上的神人羽冠上的這種紋飾。

羽人的名稱，最早見於《山海經》：

其一，「海外自西南販者...羽民國在其東南，其為人長頭，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鳥東南，其為人長頸。」(《山海經·海外南經》)

其二，「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山海經·海南西經》）

其三，「有成山，甘水窮焉。有羽民之國，其民皆生毛羽。」（《山海經·大荒南經》）

根據這一最早史籍記載，似可告訴我們：第一，「羽民國」的羽人形象，大體為長頭或面頰尖長、體長羽毛、鳥喙和赤目等。晉人郭璞在註《山海經》的第一條記述時，還援引《啓筮》的話說：「羽民之狀，鳥喙、赤目而白首。」這所言「體生羽」，當然不排除生理上的體部長有較多的毛，但主要是指那種平日喜愛用鳥羽作衣冠或裝飾的民族。比照這些古文獻中有關「羽民」特徵的描述，新出土的側身玉羽人正與之吻合，不僅鳥喙、體長羽翼和羽毛，雙目還塗殊產生「赤目」效果。第二，「羽民國」所處的時代，應是商以前的唐、虞、夏之際。《山海經》雖充滿一些荒誕的神話般色彩，但揭去其面紗，仍可窺看出堯、舜、禹時期中華大地上的山川、地理、風土、人情以及民族、民俗的很多史影，其成書年代也應在商以前的夏代<sup>[24]</sup>。第三，「羽民國」的地望，應在中華大地的東南和南方，一個最大特點就是近海。《呂氏春秋·求人篇》載：「南至交趾、孫樸、續樞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東漢高誘註：「南方積陽，陽數極於九，故曰九陽之山地也，羽人鳥喙，背上有羽翼，裸民不衣衣裳也，鄉亦國也。」西漢劉安《淮南子·墜形訓》也載：「澤水出其西北，入於南海羽民之南。」「自西南至東南方，結胸民、羽民、謹頭民、裸國民、三苗民...」高誘曾註道：「皆南方之國名也。」這些，也都說明，遠在四千多年前，整個南方地區確曾分佈著很多不同的部族共同體，這些不同的部族，有著文化本質因素的內在聯繫，有著基本近同的圖騰信仰，實際上皆統屬「苗蠻」或「三苗」集團。據文獻記載和古史傳說，四千多年前，亞洲東大陸上主要分佈著三個大的集團：華夏、東夷和苗蠻。「苗蠻」也稱「三苗」，主要在南方。「三」者，

表示多也。郭沫若云：「古人數字的觀念以三為多，三為最神秘」<sup>[25]</sup>，所以「三苗」者，「苗蠻」者，都是對當時南方民族的泛稱。這些種類繁雜的南方「苗蠻」民族，儘管名稱不同，但有著本質上的文化內在聯繫，有著基本共通的圖騰信仰和崇拜，也就是說，基本都與鳥圖騰和崇拜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繫，不僅「羽民國」人是如此，就是「謹頭國」人也是「人面有翼，鳥喙」（《山海經·海外南經》），「有人焉，鳥喙，有羽，方捕魚於海。大荒之中，有人名曰謹頭。...頭人面鳥喙，有翼，食海中魚，杖翼而行。...有謹頭之國。」（《山海經·大荒南經》）「三苗國」人，「其為人相隨。一曰三毛國」（《山海經·海外南經》）。「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山海經·大荒北經》）畢源校《山海經·大荒北經》引《神異經·西荒經》云：「西荒中有人焉，面目手足皆人形，而將下有翼，不能飛，為人饕餮，淫逸無理，名曰苗民。」所以說，遠古南方「苗蠻」集團各族，都不同程度地表現出鳥喙和身帶羽翼等特徵，從這個意義上說，「三苗」或「苗蠻」集團，也可曰「羽民」集團，其分佈範圍是極為遼闊的，包括長江流域以南的廣大南方和東南地區，也即商周以後的所謂越文化和「百越」民族的分佈範圍，所謂「揚漢之南，百越之際」（《呂氏春秋·恃君覽》），《漢書·地理志》註引臣瓚的話說得更為清楚：「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

正因商周以後的「百越」地區是唐、虞、夏時期的「羽民國」分佈區，所以商以後的「百越」民族儘管「各有種姓」，分支繁雜，但不同程度地都與鳥圖騰與崇拜有著密不可分聯繫，所謂「鳥相」（《史記·越世家》說越王勾踐「長頸鳥喙」），「鳥語」、「鳥篆」、「鳥紋」和「鳥田之利」等等。至於在商周及至秦漢時期，我國東南及至雲、貴、兩廣，甚或東南亞地區出土上有關羽人的圖畫，則更是屢見不鮮。這些無疑都應是遠古時代鳥圖騰及鳥崇拜的一種遺俗和子遺。

有一問題須提出，以往在討論這件商代玉「羽人」時，多側重於仙人神話方面考慮，認

爲「我國古代有關神仙思想的起源很早」，並列舉不少漢代畫像石和銅鏡上的一些「羽化登仙」圖像爲證。事實上，正如前面所述，「羽人」的產生和日後的不斷衍化、變異等等，都應該是屬圖騰文化範疇，或是其遺俗、子遺的曲折反映，「即應該從圖騰文化的視角去破譯和解釋羽人(羽民)現象」<sup>(26)</sup>。所謂「羽化登仙」的神仙思想那是後起之事，尤其在秦漢道教興盛後更爲流行。晉人郭璞註釋《山海經·海外南經》的「羽民國條」下稱：「能飛不能遠，卵生，畫似仙人也。」《楚辭·遠遊》中有「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句，漢代王逸註曰：「人得道生毛羽」，宋代洪興祖補註曰：「羽人，飛仙也。」這些註釋都是漢晉後的文人從道家想出發而產生的一種臆測之詞。1964年西安漢長安城遺址出土的銅羽人<sup>(27)</sup>和一些漢代畫像石上描繪的神仙境界的場面，以及漢代銅鏡上的仙人禽獸圖案等等，都是道家修道羽化成仙的思想在物質文化上的反映，它們和南方一些青銅器上的「羽人競渡」和「羽人舞蹈」等圖案有著絕然不同的文化內涵，前者是道家「羽化登仙」思想產物，與古代的「羽人」毫不相關，後者是鳥圖騰與信仰的遺俗和變異，與古代羽人(羽民國)有著延綿不斷的歷史關係。早在西漢末年的王充就指斥羽人即仙人之不可信，他說：「今不言其從之昆侖，亦不言其身生羽翼，空言昇天，竟虛非實也。」(《論衡·道虛》)今人袁珂在《山海經校註》中稱：「觀此，則羽民自是殊方一族類，非仙人也。」所以在分析上述這些歷史文化現象時，必須區別對待，不能將兩者混爲一談。

#### 註釋

- (1) 李縉雲：〈從瑪瑙套環人形飾談「羽人」〉，香港《文匯報》，1991年4月4日。
- (2) 以往我們在《簡報》和一般介紹中都稱此羽人尖鼻或鉤鼻，實則不然，從其部位並比照商殷時期出土的禽類玉飾品都爲尖喙來看，當應稱鷓鴣爲是。
- (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

墟婦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頁155，圖八一，1-4；圖版一三二。

- (4) 《中國玉器全集》2：商—西周，河北美術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圖一七七。
- (5) 國立(臺北)故宮博物院《海外遺珍·玉器二》，1991年出版，圖八五。
- (6) 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鳥圖騰遺跡〉，《歷史論叢》第一輯，中華書局；〈甲骨文所見商族圖騰的證據〉，《文物》，1972年第2期。
- (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婦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頁156。
- (8) 濮陽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3期。
- (9) 張正明：〈「長江文化研究」專欄發刊辭〉，《東南文化》，1991年第5期，頁31。
- (10) 彭適凡等：〈談新淦商墓出土的神人獸面形玉飾〉，《江西文物》，1991年第3期。
- (11) 〈吳城商代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75年第7期；〈吳城遺址第四次發掘的主要收穫〉，《文物資料叢刊》，1979年第2輯；〈清江吳城遺址第六次發掘的主要收穫〉，《江西歷史文物》，1987年第2期。
- (12) 〈近年江西出土的青銅器〉，《文物》，1977年第9期。
- (13) 〈九江神墩遺址發掘簡報〉，《江西歷史文物》，1987年第2期。
- (14) 〈江西德安石灰山商代遺址試掘〉，



《東南文化》，1989年第4、5期。

(15) 〈河姆渡遺址第二期發掘的主要收穫〉，《文物》，1980年第5期。

(16) 〈潛山薛家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82年第3期。

(17) 〈浙江餘杭反山良渚墓地發掘簡報〉、〈餘杭瑤山良渚祭壇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1期。

(18) 〈江西清江築井城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76年第9期；〈江西清江築衛城遺址第二次發掘〉，《考古》，1982年第2期；〈江西清江樊城堆遺址試掘〉，《考古學集刊》第1集，1981年。

(19) 〈廣西曲江石峽墓葬發掘簡報〉，《考古》，1978年第7期。

(21) 同註(10)。

(20) 石興邦：〈我國東方沿海和東南地區古代文化中鳥類圖像與鳥祖崇拜的有關問題〉，《中國原始文化論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頁265。

(22) 《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兩木出版社，1989年版，圖221、圖222。

(23) 《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兩木出版社，1989版，圖123、圖132。

(24) 《山海經》一書的作者和著作年代，千百年來一直眾說紛紛，多還主張為戰國時作品。今考其書中豐富內涵，所言均不超出堯舜禹時代事，近讀馮英子先生〈「夸父逐日」並非神話—「山海經」新證〉一文(《世紀》，1994年第5期)，介紹美國律師亨利埃特·默茨女士的觀點，認為《山海經》係群體智慧的結晶，其成書年代當在夏禹時代的後期。所言甚是。

(25)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頁23。

(26) 金永平：〈羽人神話：鳥圖騰崇拜的變異〉，《中國民間文化》，1994年第1集(總第13集)，學林出版社，頁29。

(27) 〈西安市發現一批漢代銅器和銅羽人〉，《文物》，1966年第4期。

## The Earliest Extant Piece of Shang Dynasty Jade “Feathery Man”

Peng Shifan

[Abstract]

The Shang dynasty jade pendent carved into the profile image of a “feathery man” uncovered from Xin’gan, Jiangxi is the earliest extant piece of its kind. The jade is reddish-brown in colour and belongs to the family of pyrophyllite. The “feathery-man” is seen in profile with his mouth resembling a bird’s beak; his headdress in the form of a bird with pointed beak and jutting breast; his back covered with scales and sides depicted with feathery wings. Apparently similar examples are among the finds of the Fuhao Tomb in Henan and in the collections of museums in China and the USA, but close observation of them would reveal a number of differences including the absence of feathers and wings. Probably, the Xin’gan version was no capricious improvisation of the jade carver, but rather a reflection of a long-established cultural heritage around the drainage basins of Ganjiang and Poyang Lake, and a vestige of prehistoric bird-related cults in the Yue area. The prevalence of bird-worship and bird-totem in south and southeast China during prehistoric times is further supported by the presence of bird images and feathery depictions on a number of artefacts unearthed from Xin’gan and Wucheng.

Bird-related cults in China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Neolithic period. Cultures such as Dawenkou, Longshan, Yueshi, Xile, Hongshan, Hemudu, Majiabian and

Liangzhu all yielded artefacts with images of birds. These cults flourished best in the southern and southeastern regions, evidenced by the common adoption of bird motifs in the late Neolithic finds of Liangzhu.

Characteristically, the jade carved “feathery man” of Xin’gan coincides perfectly with the “feathery people” described in the ancient text *Shan Hai Jing*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It was recorded in this book that the land south and southeast of the Central Plain, referred to as the Yue since the Shang and Zhou periods, was resided by some feathery people during the legendary ages of Tang, Yu and the dynasty of Xia.

So far, most studies about the Xin’gan “feathery man” were trying to reveal its mythical significance by associating it with winged-immortals and immortality which, in fact, were derivatives of Daoist thoughts in the much later periods of Qin and Han. It makes better sense to attribute the emergence, evolution and variation of this image to prehistoric totemistic cult. Its relation with the ancient “feathery people” is obvious. It differs greatly in connotation to those immortals frequently depicted on Han bronze mirrors, pictorial stone tablets and the southern bronzes.